中国研究
圆园园怨年春季卷
总第 员期，圆园园怨年 缘月出版

目摇摇录

发刊词 …… 员

主题研讨：中国乡村研究
道德、仪式与农民的行为
——对 员怨缘园年代初浙北农村的文化解读 …… 张乐天 辕员
员怨缘员~ 员怨缘愿：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 …… 周晓虹 辕圆园
纠纷调解与法律知识
——以河北李村以及广西金秀的田野考察为例 …… 赵旭东 辕源园
“寺”“庙”之争：民俗精神符号再造 …… 李摇斌 辕远园
在中国乡村做研究 …… 爱德华·弗里曼 辕苑园

研究论文
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型的
摇建立及其嬗变 …… 翟学伟 辕愿园
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更喜欢哪一种广告诉求
——全球式还是本土式？ …… 周摇南摇白乐寿 辕员园园
素质的身体政治学 …… 安·安娜诺斯特 辕员园愿
评中国的《美国人权报告》
——一个埃及人的视角 …… 穆罕默德·塞里姆 辕员员苑
风险社会与中国人口结构安全 …… 李建新 辕员员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评与随笔
“新传统主义”的真义与走向
——读华尔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汪和建 转引自
运动中的乡村道德与权力
——毛泽东时代的陈村领导及其道德困境 …… 郑摇欣 转引自
难忘香港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高摇华 转引自

英文目录与摘要 …… 圆猿

稿摇约 …… 圆源

中国研究
编辑委员会名单

编 委 会 （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摇[illegible]
摇摇摇摇摇（美国华盛顿大学）
摇[illegible]
摇摇摇摇摇（美国芝加哥大学）
摇[illegible]
摇摇摇摇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摇范摇可摇（南京大学）
摇风笑天摇（南京大学）
摇高摇华摇（华东师范大学）
摇黄摇平摇（中国社会科学院）
摇李路路摇（中国人民大学）
摇李培林摇（中国社会科学院）
摇李摇强摇（清华大学）
摇李友梅摇（上海大学）
摇林摇南摇（美国杜克大学）
摇马摇戎摇（北京大学）

摇[illegible]
摇摇摇摇摇（印度德里大学）
摇乔摇健摇（台湾东华大学）
摇[illegible]
摇摇摇摇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摇[illegible]
摇摇摇摇摇（美国哈佛大学）
摇汪摇晖摇（清华大学）
摇谢寿光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摇杨念群摇（中国人民大学）
摇刘间文俊摇（日本东京大学）
摇翟学伟摇（南京大学）
摇张乐天摇（复旦大学）
摇周大鸣摇（中山大学）
摇周晓虹摇（南京大学）

主摇摇编：周晓虹摇谢寿光

主编助理：
摇张玉林摇（日本京都大学博士）
摇杨德睿摇（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摇周培勤摇（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博士）

发摇刊摇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illegible]）可以看作是[illegible]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illegible]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illegible]和[illegible]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

（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圆圆豫年 缘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道德、仪式与农民的行为

——对 20世纪50年代初浙北农村的文化解读

张乐天*[1]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浙北农村的变化奠定了一个新时代的基础和发展路径，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回顾了解释这种变化的三种主要观点，尝试着开拓文化解释的新视角。文章认为，道德与仪式是文化解释的两个关键词。对“好人”道德的仪式化张扬树立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道德形象，对“坏人”道德的仪式化批判拼凑出阶级分化的图景，而翻身仪式则烘托出一个崇高的道德圣人，一个救星，一个克里斯玛权威。文章认为，共产党对于革命仪式的策略运用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浙北农村建构了革命的表象，而当革命的表象逐渐颠覆了村落传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以至于掩盖（甚至替代）了真实的生活时，一种强有力地左右着农民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式渐渐清晰了起来。文章试图以“剧场社会”这个新概念来指称此后支配着毛泽东时代中国村落与农民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式，以供讨论。

关键词：道德仪式剧场社会

一摇一个问题，三种解释

1949年4月浙北解放，此后，浙北农村像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并一步步引导农村走上了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构了乡村发展的逻辑起点，设定了乡村演化的

*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路径，从而成为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关键时期。然而，当我们认真考察浙北农村 缘园年代初期的情况时，我们会为一个问题所困扰。浙北农村是新解放区，解放以前，农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和平接管海宁县的“南下”干部才数百人，他们凭借什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在农民中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真正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中国农民是传统的、一盘散沙式的，缘园年代初期，他们被什么所吸引，被什么所“征服”，从而很快改变了行为方式，使农民的行为根本不像常人所理解的“农民”？翻开那个时代的历史可以看到，是农民斗倒了地主，是农民打掉了菩萨，是农民自己交出了土地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农民的支持才使乡村政权的更替得以可能，正是农民以自己的行为塑造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自己的行为给传统的土地涂抹上革命的色彩。保守的农民为什么会有革命的集体行为？

人们试图解释那个时代的农民的行为。至少有三种解释值得关注。

第一种解释强调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早在员怨猿怨年，毛泽东就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许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毛泽东，员怨猿怨：员员）解放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类似的观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实现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贫农是可以依靠的？为什么共产党确信贫农会按照党的指示去做？“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毛泽东，员怨缘缘：苑园员，愿缘苑）当然，贫苦农民不可能自发地起来革命，自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一次次斗争过程中，党需要“不断地启发和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行动起来”。（陈明显、张恒等，员怨愿怨：缘苑）由于在 缘园年代认真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的方针，共产党有效地动员农民按照党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在顺利进行了土地改革以后，又成功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对照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情况，国外学术界有人提出“参与式动员”和“中层干部首创说”等解释框架（卞吾，员怨怨愿），这些解释都以农民的政治认同为前提。

第二种解释着重关注利益诱导对于农民的行动的影响力。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我分析了传统小农的行为特征，提出

了“利益诱导”概念。书中谈道：“在合作化的过程中，乡村政府利用权力帮助首先组织起来的农民，让他们得到实际利益，从而诱导组织外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张乐天，员怨愿怨：还员）实际上，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央宣传农民的主要策略就是利益诱导。早在员怨猿缘年员员月员缘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就写道：“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的贫困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陈吉元，员怨愿怨：员缘）曹树基先生最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一文中将国家对于农民利益的关注分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农民积极参与的原因，他说：“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对于利益的顶真，有时可以称得上锱铢必较。‘接受’可以被迫，但‘认同’则必须得到实际的利益。土地改革存在符合农民利益的利益诱导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此后，对于农民长远利益的承诺又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成败的关键（曹树基，圆园园缘）。当然，学术界也有人从稍稍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利益与农民行为的关系：农民的土地本是共产党给的，所以几年后共产党再把土地拿回去，农民还能接受（卞吾，员怨愿愿）。

第三种解释关注权力对于农民行为的极大影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政府的权力自始到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权力使意识形态的输入更顺利，而权力的理想目标一旦与传统农民的家庭本位的价值观相契合，大多数农民一旦被纳入超越传统的新的制度之中，政府的权力也因此而大大加强。……武装的权威所具有的强大威慑力使那些反对合作化的人们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确保了合作化运动的畅行无阻。”（张乐天，员怨愿怨：还员~还圆）与这种解释相关的另一种解释注意到“国家原小农”格局。在国家方面，解放初期，国家基层政权一直延续到行政村，各村都建立了村公所；各区建立了全副武装的区中队，并建立了区人民法庭，以随时打击农村中的反动分子。政权组织以党为核心，在党的周围又建立了直接受党指挥的各种群众组织。在小农方面，各种可能显示农民自己力量的传统的东西，如财富、宗族、神庙等等，都被摧毁，小农都变成了单个的农民，无所依从的小农只得依赖政府。

上述三种解释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农村缘园年代的社会变革。第一种解释更多具有策略的意义。[①] 可以说，正是因为共产党采取了依靠贫农、

① 如果我们认真对照在土地改革的不同时期共产党对于富农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土地改革路线的策略意义。

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才可能取得土改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就此而言，它使我们从一个方面理解了 缉园年代浙北的农村变革与社会建构。然而，共产党用什么方式才可能动员那么多贫苦农民行动起来呢？第三种解释关注权力的格局，关注以权力为背景或者由权力直接推动的事物变化的趋势，变化的趋势一旦明了，农民就会“顺潮流而动”。然而，权力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许多贫苦农民参与的产物，贫苦农民为什么会冒着风险加入新的组织呢？

第二种解释似乎可以提供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都或明或暗地隐含着第二种解释。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诉诸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中，村落里的大部分农民都得到了好处，尽管从现在的眼光看，农民得到的利益十分有限 （曹锦清等，员怨怨缘：猿愿~源苑；张乐天，员怨怨愿：缘员~缘缸。但是，对只有二、三条破凳的农民家庭来说，分到二条好凳子无疑会让家里人念念不忘。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政府也通过经济支持来诱导农民入社 （张乐天，员怨怨愿：远员。利益诱导可能部分地解释农民的行为选择，却仍留下了不少难以解释的疑问。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是他们家庭世代积累的，农民为什么能心安理得地去占有？菩萨是农民世代膜拜的神圣的象征，他们怎么可能自己起来打掉？在“献宝”运动中，自私的农民为什么可能拿出了家里的财宝支援抗美援朝？在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交出土地证参加高级社，预期利益的假设能充分说明这一行为选择吗？在 缉园年代，许多普通的农民积极参与各项农村工作，不仅没有报酬，还牺牲很多自己的利益，什么力量推动他们如此行为？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注意到，对 缉园年代的分析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回顾近十多年以来浙北农村调查的经历，我常常感慨于联民村的老人们对于 缉园年代初期的乡村生活还保留着那么多的记忆。斗地主、打神庙、“献宝”、扭秧歌，这一幕幕场景编织出耐人寻味的时代画卷，呈现出缉园年代初期的“不平常性”。本文将致力于揭示这种“不平常性”的内涵与底色，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那个时代的农民的行为，从而理解乡村政权的更替和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化。

二摇“好人”与新国家的道德形象

自从 圆园世纪初叶以来，浙北农村经历了缓慢的变化。到 源园年代，浙北农村呈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幅图像。宗族衰弱了，族长的作用十分有限，大多数宗族不举行祭祖活动；长老统治的概念并不足以分析当时村内

的权力关系。神庙系统衰弱了，香火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旺，有些庙宇的房子被用作学校的教室。多数农家生活艰苦，但总还能活下去。社会混乱，盗贼纷起，市场凋敝，传统村落文化式微。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军六十七师一九九团进军海宁，很快占领了海宁城。4月21日，来自山东省肥水县、长清县的近200名南下干部到达海宁县政府所在地盐官，两天以后，南下干部接管了伪政权，海宁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海宁是和平解放的，但是，在农民眼里，解放军和南下干部都是“兵”。

海宁的农民见过各种“兵”，他们对“兵”的印象极坏。农民们起初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新来的解放军，在与解放军有了接触以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陈家场的一位妇女向我们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的情形。

> 那一天我在河边洗尿布，路上走过几个解放军。我一看有“兵”走过来，十分害怕，转身就想躲到家里去。一位长着一副娃娃脸的解放军和气地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是为老百姓的。”这时，我那才二岁的儿在场地边跌了一跤，哭了起来。一位解放军马上跑过去，扶我儿子起来，帮他拍掉衣服上的灰尘，还不断哄他，让他高兴。见到这情形，我也不怕了。解放军真的是好人。

海宁的南下干部当时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金，仅有每人每月四两（十六两制）老烟和一斤猪肉钱。他们身着土布军装，脚穿粗糙的布鞋。他们在县内开会都靠双脚走路。[①] 如果当天不能来回，他们还要自己带铺盖。海宁一些当地人看不懂新政府干部的行为，他们私下里向南下干部们打听是怎么一回事。下面一则对话是50年代一位南下干部的回忆：

> 有人悄悄地向干部打听：“同志，你们拿多少薪金一个月？“
> “我们没有薪金。“
> 人们惊愕了：“那么，政委和县长呢？“
> “也没有。我们上下平等，大家都一样。“
> “那，——你们为什么甘愿吃这么大的苦？还要打仗、拼性命？”
> “为革命呀！为穷人翻身解放，将来都过好日子。“

① 当时海宁县交通还比较发达，有车有船，但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海宁县内不准报销交通费，也没有任何的住勤补贴。

“你们真了不起！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下竟会有这种事！——还以为你们都把钱寄到山东去了呢。”（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illegible]）

“好人”解放了海宁，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到来冲击了平静的乡村。在街头，在茶馆，在亲戚朋友的交谈中，农民们谈论着各种新鲜的事情。猿个月以后，一次群众大会震撼了海宁的农民，使好人及其道德升华。下面的故事因为被陈家场一带的农民们反复地讲述而一直流传到了 [illegible] 年代。①

[illegible] 年愿月某日，海宁许村区人民政府内，中共许村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王芝印、区长王绪生和组织委员李开进等人正在研究工作。区中队的马桂林班长正在一边擦枪，不慎走火。突然，“砰”的一声，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楼下的居民蔡洪根。

蔡洪根 [illegible] 岁，与其母亲一起住在区政府楼下厢房里。母子俩原与区政府关系很好，儿子突遭横祸，母亲悲痛欲绝。许村地区的居民和农民们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区委立即把情况报告上级，并得到上级指示：为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使新区人民了解和信任党，就地枪决马桂林，妥善安排他母亲的生活。

第三天，许村潮王庙开群众大会，上千人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大会开始，区长讲了走火经过，并宣布上级的决定：立即枪毙马桂林，终生赡养蔡洪根的母亲。会场窒息了，突然有人喊：他不是有意的，不能枪毙他。蔡洪根的母亲哭着跑到台前，当场认马桂林为干儿子，舍命也要保下他。马桂林终于免于一死。（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illegible]）

群众大会是区委刻意安排的，从会场的布置到群众的参与，犹如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大会以悲剧的方式展开，不仅使其中内含的“好人”道德更具有震撼力——如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即使完全是无意的，也可能受到枪毙的惩罚，而且使“好人”道德净化为革命道德，使个人道德升华为国家道德并在农民中树立起国家的权威。群众大会以震撼人心的仪式征

① 本文作者在 [illegible] 年回到家乡时还听说过这两个故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服了农民，农民从仪式展开的过程体察到了新时期的新道德——国家的道德形象是极其纯洁的，国家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一切破坏了道德形象的人，即使他们是无意的，即使他们曾经是国家同志。

这个故事很快在浙北的一些地区传开了，并且传了很久很久。这说明，群众大会实现了组织者的一个目标：宣传群众，扩大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农民中的影响。这说明，群众大会作为革命的仪式实现着仪式的功能：仪式结束了，但是，仪式所建构的革命表象却继续在发挥着作用，继续在影响着农民的行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农民如何“传”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尚道德在那些方面恰恰与传统农民所推崇的“好人”道德相契合——这种契合说明新国家有深厚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民如何接受国家的道德形象或者说道德化的国家——这种接受过程让我们看到，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参与了“建构”新国家的过程。

流传于盐官地区的“版本”对故事情节做了重大的“修正”。故事中添加了马桂林的一些英勇事迹，说他在淮海战役中如何一枪撂倒两个敌人。公审会的地点移到了盐官。故事中说，在宣布枪决的时候，一匹快马从杭州方向飞奔而来。通讯员带着马桂林的老战友、一位部队高级干部的手令来救马桂林了。但是，正当这位通讯员高喊“枪下留人!”时，枪声已响……流传的故事既包含着传统道德的诉求，也折服于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大公无私。同时，盐官是当时海宁的政治中心，公审地的移位意味着农民把公审仪式与国家的想象联系在一起——这种想象也会以新的方式影响、制约农民的行为。

三摇“坏人”：图像化了的阶级区分

“好人”解放了海宁，海宁的解放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很快建立了县、区新政权。紧接着，工作队下乡，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建设新的乡村机构。海宁县伊桥乡 缘组成立了全县最早的农民协会，员额[illegible]年 员员月 圆日，伊桥乡召开了全乡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乡农民协会，选出委员 圆袁人，正副主任 缘人。贫苦农民掌握了农村基层的领导权。

海宁县委决定在伊桥乡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开始搞的是“和平土改”，认为“不费一枪一弹而使敌人缴械投降”是“上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不强调斗争，这样“于和平建设有利” （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

[illegible]。伊桥乡的土改于[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完成。但是，土改结束以后，地主、富农依然神气，农民仍然“尊敬”地主，见了地主还像以前那样叫“大先生”、“大爷”。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农村中长期存在着土地和财产占有不均的情况，存在着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间的矛盾、冲突与怨仇。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有哪一个贫苦农民可能无偿地去占有属于地主家的土地呢？又有哪一个贫苦农民会跑到地主的家里去拿属于地主的东西呢？有哪一个富人愿意让人无偿占有自家的土地呢？

传统的道德约束着农民的行为，支持着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传统的社会秩序同时是由富人支配的权力结构。因此，要进行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建设一个平等的乡村社会，就要改变乡村的权力关系，同时也要改变农民的道德观念，开展一场思想的和价值观念的革命。“事实告诉我们：土改不仅要在经济上摧毁封建制度，而且要在思想上摧毁封建势力，不经过阶级斗争，不能打垮地主几千年来在农村的统治势力。”（中共海宁县委办公室等，[illegible]）所谓“在思想上摧毁封建势力”，就是要让贫苦农民意识到，地主阶级是“坏人”，他们占有那么多的土地和财产是不道德的，是不公平的，是恶的；剥夺“坏人”的土地和财产不仅是道德的行为，而且是善的、进步的、革命的行为。

然而，现实中的地主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地主确实为富不仁，但有些地主与贫雇农关系良好，有些甚至备受村民的敬重。如何才能使地主变成一个划一的不道德的“坏人”呢？“谁养活谁”的讨论是当时采用的教育农民的方式之一（编写组，[illegible]），[1] 它常常与仔细选择的“苦大仇深的”农民的诉苦相结合。诉苦是道德仪式，它借助仪式力量改变农民的道德观念，建构革命的表象。下面一则摘录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 长安区泰山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听了典型诉苦之后，又看了长安镇海宁二中演出的戏剧《王秀鸾》，大家激动得诉呀哭呀，不睡不吃，从白天搞到晚上，从晚上直到天明，许多雇贫农眼睛哭肿，喉咙哭哑，最后泣不成声，但心中充满了阶级仇，民族恨！那情景，那

① 在上海郊区农村，这种教育方式因一首流行的名为《啥人养活啥人》的歌曲为人们所熟知，这首歌的开始几句歌词是：“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想一想啊！地主搭仔农民到底啥人养活仔啥人啊？呒没我侬来种田，天上不会落白米。半夜困，五更起，车水垒地全要用力气呀。地主勿种田啊，仓库堆满上白米呀。”（《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编写组，[illegible]）。

决心，使人们感到他们可以随时准备为打倒敌人而豁出命去！（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illegible]）

比诉苦更有震撼作用的是发动群众斗争仔细选择的“罪大恶极的”地主，[1] 让过去受过苦的贫苦农民揭发地主的罪行。这种斗争大会不仅恶魔化了地主，而且可能成为真正的“驱魔仪式”：斗争会结束以后，“恶魔”地主可能马上被逮捕甚至枪决。海宁县的第一个斗争大会在硖石区柏墅乡召开，斗争该乡大地主汤松涛。据记载，那一天，柏墅乡的农民一早就起来赶赴斗争会场，祝场、大桥、伊桥、马桥等周边几个乡也都“四面八方响起”锣声，群众纷纷会聚，民兵们肩扛红缨枪、猎枪在前面开路，通往斗争大会会场的条条小路都“旌旗蔽日、锣声震天”。下面摘录几个斗争会上揭发的故事，以看清斗争大会所包含的道德意义。

有一次一位农民挑着粪迎面遇见汤松涛，他没有听清汤松涛呼喝他退回，就被汤飞起二脚把粪桶踢到了田里，临走还给了他二个耳光，蛮横无比。

汤松涛准备造楼房时看中了邻居汤汉荣家的房子，就借他欠租不交的理由，把汤汉荣全家逐出，夺取了他家的房子。汤汉荣说：“汤松涛简直是土皇帝，谁敢向他讲理？我被他夺取了房子，有泪只能向肚中流。”

汤氏老太与儿子、媳妇一家三口租种汤松涛的几亩地，过着贫穷的生活，民国[illegible]年大旱后，欠了汤二年的地租，汤不顾娘儿三个的苦苦哀求，一定要抽回土地，逼死了她的儿子，走掉了媳妇，从此老太家破人亡。无依无靠的老太以乞讨为生，以泪洗面，终于哭瞎了眼睛。（中共海宁县委办公室等，[illegible]）

这些故事揭发了地主的罪恶，激起了群众的愤怒，硖石区人民法庭分庭当场逮捕了地主汤松涛。斗争大会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刻画了地主阶级的恶的形象，使斗争地主、均分土地和财产具有正义的、道德的和革命的性质。

---

① 为了配合各区乡开展阶级斗争，海宁县于[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建立了县区人民法庭，以随时镇压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土改时期太平村[①]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工作队选择坏人“典型”的策略。解放初期，工作队开始准备选太平村为土改的试点，但发现该村没有很坏的地主，就放弃了试点。太平村共有四户地主。陈松林全家在外，被称为逃亡地主。陈梅林主要在长安开酱行，其妻钱美芬在陈家场家中，成分为工商地主。陈惠康在家中行医，祖上传下不少土地，被定为地主。还有一位是破落地主冯子欣。在土改高潮时，在家的地主冯子欣和陈惠康都被批斗了，但是，“斗地主，没有声势，只得平衡地分了土地、部分房屋和家具”。（回忆录，[illegible]）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地主妻子的“待遇”。钱美芬当时也被批斗了，而且被戴了高帽子游村，帽子上写着五个大字：“我是雌老虎”。这五个字已经充分揭示了她会被如此对待的全部原因。后来，她又因送两瓶酱油给农会主任沈兴荣而被关禁闭，强迫劳动。

一场场善良反对邪恶的道德戏剧在浙北乡村各地上演，改变着权力关系，改变着文化气氛，也改变着农民的道德观念。土改在这样的背景下胜利实现了其历史的使命；这样的背景本身是土改的有机组成部分。土改以道德仪式化的方式图像化了阶级区分，并塑造出以阶级区分为基础的新社会。

道德戏剧落下了帷幕，但道德仪式化的影响力是长远的，图像化的阶级区分成为新时期的标签。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区分坏人的文化还左右着浙北乡村农民的行为。下面一则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如何根据善与恶的标准来处置人。

> [illegible]年土改以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本村王宝生过去杀过人，联新的胡生林过去打死过人，都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杀的和打死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杀了人，人们拍手称快，为人民除了害。我不清楚所杀的人和打死的人，据说是别地方的人，到这里来敲诈勒索，胡作非为，欺压人民。在“镇反”时期，根本不追究这二件事。直到“文革”时期，王宝生被列为杀人凶手，进行审讯。当时他已年老，心里又怕过不了关，最后自杀身亡。自杀反而加罪，叫做畏罪自杀，死了，就是白死。（回忆录，[illegible]）

四摇“救星”：神圣化了的克里斯玛权威

土地改革给大多数农民带来了实际的利益，联民村的许多老人至今还

① 太平村后来与塘南村合并，组建成联民村。

记得当年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情景，土改时留下的原始资料更清楚地记录了当年的情况。

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原耕指的是土地的使用，即土地的使用权的状况。土改时土地的调整以原先土地的使用为基础，从原则上说，如果某户耕作的土地多于全乡的平均数，他家的土地就要调出；反之，该户则可能分进土地。实际的操作当然要灵活得多，农户间少量的土地多或少不会做什么调整。由于农户大都根据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情况来确定使用土地的数量，土地使用权的调整十分有限。例如，在随机保存的祝会乡太平村 怨圆户农民的土地分配资料中，远源户农民的土地在土改时没有抽补调整，占样本总数的 远怨缘；抽出土地的 圆园户，占 圆员缘；愿户农民补进了土地，仅占 怨缘（张乐天，员怨愿怨：缘圆）。

土地占有的情况在土改前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太平村，远户雇农土地改革后增加了 员猿员愿缘亩土地，户均增加 圆园员愿亩；全村 怨缘户贫农中 猿怨户（占全部贫农户的 源缘）增加土地 苑员员员怨亩，户均增加 员愿员愿亩；全村 怨圆户中农中 圆远户（占全部中农的 圆员缘）增加土地 猿员员猿缘亩，户均增加 员圆员源亩。

表 员摇太平村农具、家具、房屋、余粮分配情况表

	雇农		贫农		中农		其他		留作
	户数	数量	户数	数量	户数	数量	户数	数量	公用
农摇锄头			员	员					
摇摇铁搭			源	源	员	员			
具摇其他			员猿	员苑	缘	远			
摇摇摇床			缘	缘	员	员			
家摇铺板			员圆	员猿	缘	缘			
摇摇桌子	猿	猿	圆苑	圆苑	缘	缘			
具摇板凳	员	圆	远愿	苑圆	缘圆	缘愿			
摇摇其他	远	员苑	怨缘	员远	愿苑	员猿员	圆	源	
房屋（间）	员	员猿缘	苑	员圆	员	员猿缘		员圆	
粮食（斤）	远	圆圆苑	怨缘	圆圆猿源	怨圆	员源源愿		员怨	

注：引自《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第 源员页。

太平村土改时共有四户被评为地主，除留下部分房屋和家具以维持最起码的家庭生活以外，他们的房屋和家庭用具大都被没收。太平村当时是“自给村”，没收地主家的东西全部在村内分配。表 员反映了当时分配的总体情况。

村里极少数地主、富农家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了比较贫困的农民，从一方面说，“少数地主富农的财产一旦分散到为数众多的贫雇农手中，远不足使他们马上富裕起来。与‘僧多’相比，‘粥’永远是少的。”（曹锦清等，[illegible]）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本来只有一两张桌子的某贫困农户来说，增加一张桌子也是难以忘怀的大的收获。但是，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分配了土地和财产以及农民本身的感受，更在于分配过程的仪式化，在于“翻身仪式”中所张扬的新道德以及所建构的克里斯玛权威。

典型宣传是当时广泛使用的宣传策略。每个地区总有一些解放前生活特别艰苦的农户，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极大的改观。对这些农户的反复宣传使得农民们“强烈地”感受到解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联民村，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知道“翻身户”陈青风家。当年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illegible]年代，讲起翻身解放，大家都会讲起陈青风。[illegible]年代后期，当联民村的老农民回忆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讲起陈青风。下面的一则回忆记录或许可以折射出当年的情况。

> 陈青风这户人家，他的父亲早死，家里没有房子，土地很少。母亲叫雷阿大，早年讨过饭，解放前经常给他人打工，生活非常困难。土改分到了房屋，也分到了部分土地，从此有了居住的地方，也有了耕种的土地，生活逐步改善了。这户人家才彻底翻了身。
>
> 这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当然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户同样也翻了身，该从何说起呢？那时叫做“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是一场革命，因为历史上土地都是买卖的，土改无偿调整了土地，使每户人家，每个人口，每个劳动力都得到土地。经过土改，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也翻了身，广大农民扬眉吐气了。（回忆录，[illegible]）

在地改时期，土地和财产的分配是最重大的事件，海宁市各地都举行极其隆重的仪式，庆祝土地改革的胜利，庆祝农民的“翻身解放”。下面两则记录初步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 盐官区荆山乡、长安区泰山乡以及别的许多地方都在土改胜利庆功大会上宣布了土地、农具等的分配情况；同时，焚毁了地主旧田契和债券。在熊熊的烈火中，在像雷鸣一样的掌声中，几千年藉以压迫农民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文件，如同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一样，在烈火

需要生产请访问 www.cnfolkbook.com